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重大项目 ICS-2012-A-04

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历史演变研究丛书

吕拉昌 主编

元代及元代以前



北京



城市形态与 功能演变

· 朱祖希 著 ·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重大项目ICS-2012-A-04

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历史演变研究丛书 / 吕拉昌 主编

元代及元代以前



北京



城市形态与 功能演变

· 朱祖希 著 ·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代及元代以前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朱祖希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12

(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历史演变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23 - 4665 - 4

I. ①元… II. ①朱… III. ①城市史 - 研究 - 北京市 - 古代 ~ 元代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6606 号

元代及元代以前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

YUANDAI JI YUANDAI YIQIAN BEIJING CHENGSHI XINGTAI
YU GONGNENG YANBIAN

朱祖希 著

出版人: 卢家明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 //www. scutpress. com. cn E-mail: scutel3@scut. edu. cn

营销部电话: 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策划编辑: 王磊

责任编辑: 江肖莹

技术编辑: 杨小丽

印刷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960mm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79 千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 000 册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城市形态与功能研究是城市研究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狭义的城市形态是指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空间的物质形态，而广义的城市形态不仅包括城市的物质形态，也包括经济活动、社会文化、居民构成等非物质文化的社会形态。城市功能是城市在国家或区域中所起的作用、所承担的分工。城市形态与城市功能有密切的联系。城市功能依托于城市形态，对城市形态的变动有重要的影响。城市内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布局存在一定的差异，即是城市功能分区。城市功能分区是城市功能与形态的具体体现与结合。但是，城市的形态与功能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形成的，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体现时代的特点。虽然，当今城市研究已经进入数量化、大数据时代，但分析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历史演变始终是城市研究的重要主题。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其历史演变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辽代以前的北方重镇蓟城，至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再至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民国北平城，乃至建国后的首都北京，其城市中心位置的选择与变动、城市形态的建立与变迁、城市功能分区的形成与变换等，从物质形态到社会、职能形态，均对北京城有着深远的影响。北京城在三千多年历史演变过程中，其城市整体形态的传承过程以及传承机理，是北京如何发扬城市历史文化影响力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课题。

传承北京城悠久历史文化，历史古城的保护是重中之重。当今城市遗产保护已不局限于建筑、街道、遗址地等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重视。城市、遗产地的整体性保护议题也是目前古城历史文化遗产领域的热门方向。北京作为多朝古都，在历史文化街区划分、遗产地分级保护等传统方式之外，对于城市整体形态的保护，将成为未来城市保护的发展方向。而要做好城市整体形态的保护，对其历史演变及传承性的深入探索，是最应重视的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具指导意义。

现实的北京发展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如何处理世界城市建设与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如何解决北京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展问题？

如何处理首都功能与其他城市功能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有科学的答案。但给出科学答案的重要一环就是要尊重历史，深入探讨北京城历史演变的具体过程和内在影响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当今北京城市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思路。

本丛书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重大招标课题，课题名称为“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历史演变”，各个子课题之间虽然以时间段划分，在时间轴上却是连续的整体。每个时间段内，基本内容都包括对当时北京城形态的研究、城市功能与功能分区格局的研究以及形态与功能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五个子课题，分别是：元代及元代以前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演变研究；明代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演变研究；清代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演变研究；民国北京（北平）城市形态与功能的演变研究；建国后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演变研究。研究方法上，主要利用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注重多学科交叉及地理学新技术应用，利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结合城市空间形态理论、功能结构理论、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的理论，分析北京城形态和功能的历史演变问题。研究分工如下：元代及元代以前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研究由朱祖希完成；明代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研究由王越完成；清代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研究由赵寰熹完成；民国北京（北平）城市与功能演变研究由孙冬虎、王均合作完成；建国后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研究由吕拉昌、黄茹等合作完成。课题2012年开始，2015年完成，历时三年，三年中各课题组成员付出了巨大努力，按时、按质完成了研究任务，然而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演变研究实在是一个深奥与宽广的课题，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期待更多更高水平的成果出现。

在课题完成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领导与学者的关心、关注与帮助。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原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心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官辉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陶东风教授，中科院地理所方创琳研究员，北京市规划院研究室副任何永，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院长李小娟教授等，对课题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吕拉昌 尹钧科
2015年8月于北京

绪 言

城市，是人们公认的人类三大文明的标志之一。

有人说，没有城市文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古代的城市的历史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城市的历史。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地域相当辽阔，各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相当复杂。尤其是在文明起源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争妍竞秀，而且常常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交织成一幅瑰丽的图景，为后来独特灿烂的中国文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是多元化的。例如，中国文明出现前夜的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上游地区，是继承甘肃仰韶—齐家文化的氏羌文化区；在黄河中游地区，是继承仰韶—河南龙山文化的华夏文化区；在黄河下游及江淮流域，则形成了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区；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具有湖北龙山文化特色的苗蛮文化区；在杭州湾两岸及太湖流域，存在着由良渚文化孕育形成的吴越文化区；在燕山以东的长城内外，则形成了以红山—富河文化为主的燕辽文化区。考古研究证明，在上述六大文化区中，中原华夏文化区在中国文明诞生之前，便已居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它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坚实基础。这是因为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温暖湿润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以及松散肥沃的土壤，而且其土壤的肥力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流域和地区。这便是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文明摇篮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而在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前 1000 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始终在中原地区，且沿着长安—洛阳—开封这一东西向的轴线呈徘徊式的移动；后 1000 年，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才逐步向东南方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南京—杭州地区转移。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也孕育了代表人类文明的城市。“城市”一词，最早见之于中国典籍的，当推战国时期的史籍。

《韩非子·爱臣》云：“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今有城市

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但是实际上，“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在古代是指在一定的地域上用于防卫而筑起的城墙。“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城为保民为之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所以，这时的“城”实质上只是一座具有防御性的“城堡”，它仅仅是作为统治中心而存在的。在古代诸凡王朝领地、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皆称“城”。“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即买卖交换商品的场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防御功能的“城”与商品交换的“市”已经结合在一起，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一词。然而，“城”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语言中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词语，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私有财富的出现和积累，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掠夺财富的斗争，筑城自守就显得非常必要，“城”也便应运而生。而在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一时期“城”的记载，诸如“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黄帝筑城造五邑”“夏鯀作城”“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等，也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我国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多座城址，如城子崖、后岗、王城岗、平粮台等。这些城址大都是出现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个别可达中期。这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古史传说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如果从“城”的最初职能主要是为防御而论，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就已有了防御性的设施。例如，在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的四周都发现有人工挖掘的壕沟，并在壕沟内侧设有栅栏。它们所起的防御作用，与早期“城”的功能是一样的。那么，仰韶文化时期居址四周的壕沟和栅栏，作为中国城池的萌芽或征兆，也是完全可以的。

商代的城在古代的文献中屡见记载，商丘、亳、殷、朝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都城，且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如河南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河南安阳殷墟等。这些城的规模都比较大，而且在城内外都有规律地分布着宫殿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等。从古代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商代已经有了专门交易的场所——市。“市”内还有各种各样的“肆”。“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相传姜尚

(姜子牙)在未遇文王之前,就曾在朝歌和孟津市的肆内做负贩、屠宰、卖酒的营生。“太公贫困,负贩于朝歌。”

由此可见,在商代的城中,已经出现了“市场”,这似乎已是毋庸置疑的了。不仅如此,考古发掘证明,郑州商城、殷墟、盘龙城、偃师商城等,不仅都是商代的都邑,即在客观上已成为当时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而且也具备了城市的经济性质,即除了已经出现的“市”以外,还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品交换中作为等价物形态的货币——贝,已经普遍流通。

例如,在郑州商城南北曾发现制铜作坊遗址。城南的总面积约为1050平方米,且主要出土镞范和戕(qiāng,古代的一种斧子)范;城北的面积为275平方米,主要出土刀范和戈范。此外,该城还发现了一处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制陶作坊遗址,出土陶范三四千块,且主要是以盆、甑为主的泥质陶器。而在城北发现的一处制骨作坊遗址,在其中一个窑穴中就出土了一千多种骨器成品、半成品及骨料,其中绝大多数是镞、簪。1958—1959年在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发掘的铸铜作坊遗址,其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三四千块。而在北辛庄发现的制骨作坊遗址,仅发掘的面积就达247平方米,在其中的一个椭圆形骨料坑中,出土的骨料、废料和半成品等就多达五千余种,且以骨笄(jī,古代束发用的簪子)和笄帽为最多。再从手工业的产品来看,1938年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宽78厘米,长110厘米,重达875公斤。这种巨型铜器,在当时的铸造水平下,至少需要300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

上述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和遗物,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这些城市中发达的手工业以及其规模、分工,也说明了其产品已不是专门供作坊主自己使用的,而是为了交换。所以,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手工业。据《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585)记载,周初曾俘虏了许多有手工业技能的殷民,其中有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铸氏(锉刀工或釜工)、契氏(篱笆工)、终葵氏(锥工)等。如果把这些记载与商代城址周围的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可推知商代城中的手工业至少已有青铜制造业、制陶业、骨角牙蚌制造业、玉石业、纺织业、酿酒业、建筑业、木漆制作业、编织业、制革业等十几个门类了。

商代手工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兴起,必然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在商代的墓葬中,无论是王公贵族的大墓,抑或一般平民的小墓,

都发现有殉贝现象。例如，在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座商代大墓中，曾发现了3790枚海贝；安阳小屯一座中型墓中，亦曾发现了6000多枚海贝；近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有近7000枚殉贝。可见，贝已作为一种财富，为奴隶主贵族所敛聚。同样，在一些中小奴隶主的墓葬中，亦有殉贝的现象，如郑州白家庄一座墓中，就有殉贝460多枚；安阳殷墟M₂₇₂和M₂₆₁墓中，分别有殉贝350枚和263枚。在一些平民的墓中也不乏殉贝现象，1953年在安阳大司树发掘的160座平民墓中，其中83座有殉贝；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的800多座墓葬中，有336座有殉贝。这些现象不但反映了这些墓主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而且也反映了占有者的权力和身份。

商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货币的出现，而货币的出现又反过来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繁荣。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发掘出的大量海贝、鲟鱼鳞片、鲸鱼骨、海蚌、大龟和玉制品等遗物，皆非本地所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无疑是交换而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玉，盛产于新疆，海贝和大龟则盛产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可见，商代中原腹地已与遥远的外地有了较为广泛的贸易往来。

居住规模和房屋的大小，既反映了主人财富的多寡，也反映了主人当时的身份和地位的高低。在现今所发掘的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和湖北盘龙城等商代城址中，都发现由规模宏大的夯土台基组成的宫殿区。这当然是统治者发号施令和日常起居的所在。而一般的平民住房，不但规模小，其建筑也简单。同样，墓葬的大小及其等级，也反映出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以殷墟的墓葬为例：带4个墓道的大型墓，已发现8座，墓主人是殷代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王；一般带一两个墓道的中型墓，已发现22座，墓主人是殷代社会中的大奴隶主贵族；长方形的竖穴中型墓，已发现100多座，墓主人是商代社会中的中小奴隶主；长方形的竖穴小型墓，已发现3400座，墓主人是商代社会中的平民；无墓、圻墓、乱葬坑，墓主人应是商代社会中的奴隶。而在这些墓葬中，平民的墓葬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这种多层次的阶级结构，说明“城市”在商代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代的都城既有作为阶级对抗的防御措施——城墙、壕沟，又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已有贵族、平民、奴隶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又有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它不仅已是某一历史时期国家或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而且也已是该国家、该地区实质

上的经济中心。也就是说，它已经完全属于“城市”的范畴了。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言，还是从考古发掘遗址的形态来看，我国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在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即已出现最初的城市。而到了商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已有了名副其实的城市。自然，也有了作为城市本身所拥有的功能，乃至其在空间独特的形态。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在燕山南麓、太行山东麓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化，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强大渗透，又时时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那其文化起始于何时？城市又诞生于何时、何地？遵循一道怎样的轨迹发育、成长？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它是一部具体的、真实的人类文化的记录簿。城市的历史建筑，它的空间形态、环境特色是其文化价值最直观，也是最生动的写照。

北京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世人所瞩目，对它的研究也是连绵不断，硕果累累。

“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历史演变研究丛书”旨在探索北京的城市发展历程：自出现城市之后，先成为方国的都城——区域性的政治中心；秦统一全国后又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辽朝开始在这里建陪都，称南京；金朝正式建中都，成为北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元统一全国，建大都，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又历明、清，一直至今。

“历史悠久，延绵不断，逐步升级”既为我们概括了北京城漫长的历史，也为我们提出了研究的方向，即探索并阐述北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城市形态和功能。而这也正是本研究所需要遵循的宗旨。

此书稿由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克强同学帮助录入。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朱怡斋' (Zhu Yizhai).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

2014年10月23日于虎怡斋

目 录

第一章 北京城市形态和功能演变的地理背景	1
一、自然地理背景	1
二、人文地理背景	9
第二章 《周礼·考工记》及其对古代城市形态的影响	17
一、《周礼·考工记》及其营国制度	17
二、营国制度中王城的形制、规模、结构	19
三、王城规划匠意源于“井田制”	20
四、“营国制度”对后世城市规划的影响	21
第三章 蓟城的产生和它的形态、功能	24
一、北京原始聚落的产生	24
二、北京城邑出现的社会经济基础	25
三、蓟城——北京最早的城邑	27
四、关于琉璃河董家林的燕都遗址	32
五、蓟城始建年代的确定	35
六、燕都蓟城城市功能的确立	39
第四章 隋唐幽州城的城市形态和功能	43
一、北方贸易中心和军事重镇	44
二、幽州城的城市形态	47
三、唐幽州城的重要道观、寺庙	49
第五章 辽南京城的城市形态和功能	54
一、契丹族的兴起与南下	54
二、辽南京道的设置及其功能	58
三、南京城的空间格局	60
四、南京城与天宁寺塔	69
五、萧太后运粮河	71

第六章 金中都的城市形态和功能	75
一、女真族的兴起和辽南京城的扩建	76
二、金中都城的政治功能和规划建设	78
三、金中都行宫和苑囿的辟治	95
四、金中都城的经济功能和对外联络	102
五、中都城水源的开发和利用	109
六、以中都城为中心的城镇体系	112
七、金中都城现存的几处遗址	113
第七章 元大都城的城市形态和功能	117
一、蒙古族的兴起与金中都城的衰落	118
二、元定都燕京和大都城址的确定	119
三、元大都城的政治功能和规划建设	122
四、元大都宫城的空间布局	133
五、元大都城对水源的开发	136
六、大都城的主要建设者	141
七、大都城规划设计的历史文化价值	147
参考文献	149

第一章

北京城市形态和功能演变的地理背景

历史上城市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分化和对立而形成的。但是，一个城市一旦适应社会经济的要求而出现，它必然要具备一个足以满足它的发展要求的固定城址。因此，如果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出现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合适的城址就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就是说，一个城址的确定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空间关系所决定的。这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人文地理环境。

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地处华北大平原、东北辽河平原、内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的交接之地。同时，它也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之地。就中国的都城而言，它是中国 2000 多年封建社会帝都建设的最后结晶，是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我们对于“北京城市形态和功能演变”的研究也就必须放到“大中华”的地理背景下来进行。

一、自然地理背景

1. 中华大地的地理态势

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华夏大地，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岸，太平洋的西岸。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西至帕米尔高原，横贯 62 个经度，东西距离 5200 公里；南起曾母暗沙，北至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纵跨近 50 个纬度，南北距离 5500 公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巍峨的群山、壮阔的高原、巨

大的盆地、宽广的平原、众多的湖泊和漫长的海岸线，正是它们构成了为数众多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①。

我国西部是海拔达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高原上横亘着一系列巨大的山脉，湖泊盆地星布其间。我国最长的两条河流——长江、黄河都发源于此。这便是构成中华大地地形的第一级阶梯。由此往东，北起大兴安岭、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往南延续到云贵高原，地势下降到海拔1000～2000米，其间又有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它们构成了第二级阶梯。再往东便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即由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南丘陵构成的第三级阶梯。

由于我国位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之间，海陆的冷暖气流和行星风系的季节性位移引起的季节性风系变化，使我国的气候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的特征。在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乌鞘岭—横断山以东地区，夏季主要受暖湿的海洋季风的影响，气候湿润多雨。降雨量的分布大体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冬季我国大陆受西伯利亚高压的控制，盛行偏北风气流，干燥而寒冷。我国气候的大陆性主要表现在年温差较大，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同时，这种受大陆性气候影响的程度自东南向西北递增。东南部地区不仅年温差比西北部地区小，湿度也较大，而呈阶梯状分布的地势又进一步加强了东部地区的季风强度，抑制了西部地区冷暖气流的交换，从而加剧了我国气候的地域差异。

东部季风区与地势分布的第三级阶梯大体相当。这里雨量丰沛，气候湿润，天然植被以森林为主，有一部分是森林草原，且地势平坦，有着广泛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

自然环境既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也有利于人类的生息繁衍。辽阔的领土、适中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质地貌结构、自然环境条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我们的祖先就世世代代地生活在这片中华大地上。

从考古发现得知，我国境内早期的人类活动主要分布在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接近东部的边缘地带。这里不仅是我国农业的起源地，而且也是人类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

^① 上海师大，吉林师大，北京师大，武汉师院，西南师院，华南师院，甘肃师大：《中国自然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页。

2. 北京自然地理格局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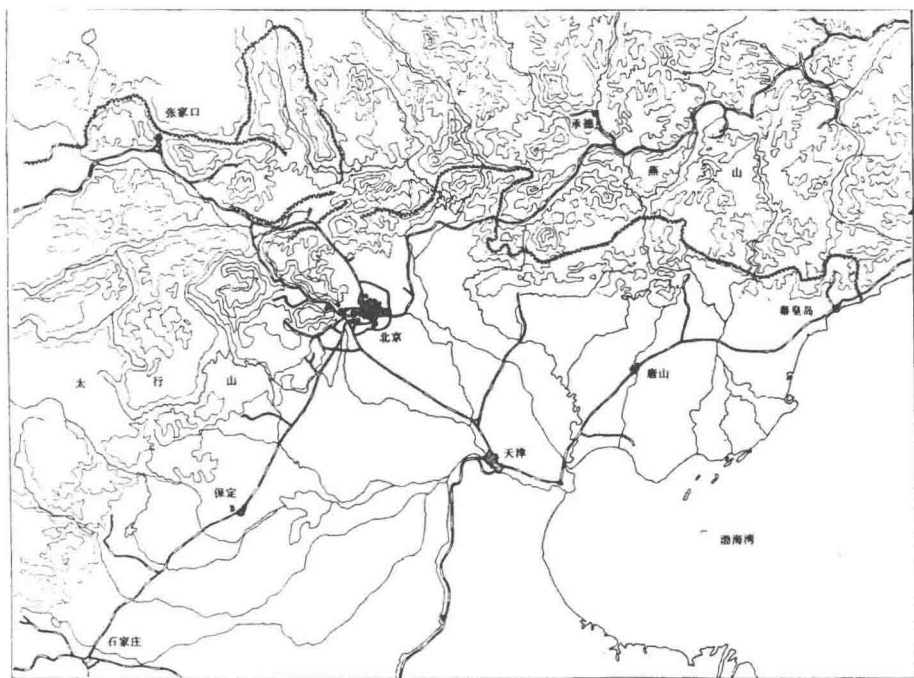


图 1-1 北京的地理环境

距今 7000 万年以前的中生代时期，是一个在我国大陆和亚洲东部地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褶皱断裂运动和差异性升降运动，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延续时间较长、次数多、范围较广，又表现得十分强烈的火山活动和岩浆的上升和侵入作用。而与此相关的则是断裂上升山地的剧烈冲刷破坏和断陷盆地的巨厚沉积作用。由于这些特点在现今的燕山山脉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在地质史上就把这一时期的运动统称为“燕山运动”。

北京地区的构造轮廓，基本上就是由中生代末燕山运动形成的。之后，一方面是断裂升降，其表现为东北、北部山区和西山的大幅度上升，并伴随着大规模岩浆的侵入活动。另一方面，原先趋于下降的平原地区，则继续大幅度下降，接受了巨厚的沉积，从而奠定了北京地区山脉、盆地、平原的分布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下降的格局。

北京地区的山脉大势有“左环沧海，右拥太行”之说，即北部的燕山山脉和西部的太行山脉，构成一个向东南开放的半环形山湾。

燕山山脉自距今6亿年前的元古代以来，一直趋于缓慢地隆起。由于山体不断遭受风化剥蚀，中生代侵入的花岗岩体如今大面积地暴露于地面，组成中、低山和丘陵。而第三纪以来地壳的新的活动，奠定了燕山以东西向为主干的基本山势。如第三纪发生的喜马拉雅运动，北侧的大海坨断块隆起形成中山，最高峰大海坨2234米；南侧的军都山断块隆起，形成八达岭山；正中央断块下陷的延庆—怀来盆地中，沉积了巨厚的第四纪河湖相地层。而密云县境和怀柔东北部，则由于山体的隆起，原覆盖于其上的岩石被风化剥蚀。因此，原属太古界基底的变质岩系大面积出露地表，云蒙山花岗岩侵入体也出露地表，并形成了海拔1000米的中山地貌景观。

太行山脉位于北京之西，统称“北京西山”。北京西山及其以东的平原，在中晚元古代至中生代的大部分时期，一直处于缓慢的沉降状态，堆积了厚度超过万米的地层，故又称“西山凹陷”。到了中生代晚期，受燕山运动的影响，西山凹陷因发生大断裂而逐渐解体。在八宝山—高丽营深断裂以西，断块隆起，褶皱为山；断裂以东，断块下沉为谷，其基岩的埋深在现代平原之下1000多米。到了第三纪初，大体形成京西褶皱隆起、北京凹陷和大兴隆起，即“两隆一凹”的构造单元。

(1) 京西褶皱隆起

包括北京西山及山前隐伏地带，出露地层比较齐全，包括中、上元古界，下古生界的寒武、奥陶系，部分地区有上古生界的石灰系、三叠系，中生界的侏罗系、白垩系地层。

燕山运动使地壳隆起，沉积岩层受水平力作用褶皱为山，形成“京西褶皱隆起”。尔后，又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京西隆起断裂为两部分：西部的褶皱山继续隆起，形成海拔1000米的北东向复向斜构造，即西山隆起；南口山前断裂以东，下沉断块成为沙河凹陷。

“西山隆起”最早发育的向斜中山有以下三列：

第一列即百花山、庙安岭、髻髻山等向斜山，其轴向呈北东—南西，略呈“S”状。从西南部的白草畔（海拔1983米）开始，向东依次为百花山（1991米）、老龙窝（1645米）、清水尖（1528米）、髻髻山（1524米）、妙峰山（1291米）一线。由上侏罗统髻髻山组火山岩构成向斜的核部。

第二列（往西南方向）为九龙山（858米）、香峪大梁向斜，由中侏罗统九龙山组火山碎屑岩构成向斜的核部，两翼组成物为下侏罗统和二叠系、石

炭系地层（谷坡出露门头沟煤系）。

第三列为北岭向斜（位于周口店的西北部）主峰猫儿山（1307米）。因受房山侵入岩的挤压，向斜呈新月形，其核部也是九龙山组火山碎屑岩，翼部仍为煤系地层。

与上述各向斜之间的背斜构造相对应的有黄草梁背斜、军庄（穹窿）小背斜、老爷庙背斜和马鞍山（穹窿）小背斜。复向斜构造体系遂形成宽向斜和宽背斜相向分布的“隔档式褶皱构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京西褶皱隆起中山向斜构造地层的西部为永定河所切割。河水经向斜构造地层，在北京西山以泉流的形式出露地表，其中包括被称为“天下第一泉”的玉泉山泉水，都源于永定河河水的补给。

（2）北京凹陷

“北京凹陷”位于平原区。这是一个呈东北—西南走向的不对称地堑型凹陷。其西北侧的八宝山—高丽营断裂不仅陡而且深；其东南界的通州—南苑断裂浅而缓。然而，它们都是活动性断裂。凹陷内的下古生界地层，下陷至1000～1500米深，上覆地层为数十米至数百米厚的上侏罗统、下白垩统、第三系和第四系地层，厚度一般为300～500米。上新世末或更新世初，由于受新形成的良乡—顺义断裂差异活动的控制，北京凹陷的西南部反而上升，与大兴隆起联为一体。顶部的第四系地层仅厚50～100米；东北部继续下沉，形成顺义凹陷，第四系地层最大厚度超过1000米。

由上述可知，第四纪以来，北京凹陷被分解为沙河凹陷、顺义凹陷和大兴隆起，即“两凹一隆”的断块构造格局。

（3）大兴隆起

“大兴隆起”宽约18公里，深部呈正断层，倾向偏西。断层西北盘为中、上元古界，寒武系，奥陶系地层，深埋于400～1000米处，上覆巨厚的第三系地层。断层东南盘与之相当的层，埋深仅60～300米。隆起的顶部（大兴区黄村、旧宫附近），一般没有第三系的地层，而第四系地层厚达50～150米。早更新世时，“大兴隆起”是一个剥蚀丘陵，至中更新世时剥蚀区进一步缩小，其边缘地带受严重的侵蚀切割，有大量粗细不均的沙、砾和泥质，被流水搬运至低地堆积区。侵蚀、剥蚀区的边界，大致在洼里、定福庄、广安门、大兴和房山一线。晚更新世中晚期，永定河自三家店以下出山口，形成了以石景山为顶点，由西向东展布的洪、冲积扇；潮河、白河和沟错河所

